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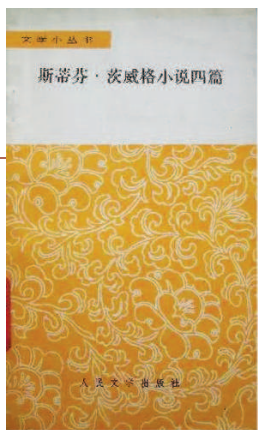
◀ (上接2版)

外期刊上发表各类成果更是难以一一统计。此外,他还在德国出版了厚达649页的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接受史、学科史、比较文学、翻译理论、中国文化外译等领域的问题。但先生用力最勤的,还是上述三位德语文坛巨擘的译介和研究,而这是和先生自身的经历和感受紧密相连的。这位正直、坚毅、挚爱、热情、无私,为理想而不懈努力的老人所翻译和研究的,大多是令其感动不已、引起共鸣、奉为楷模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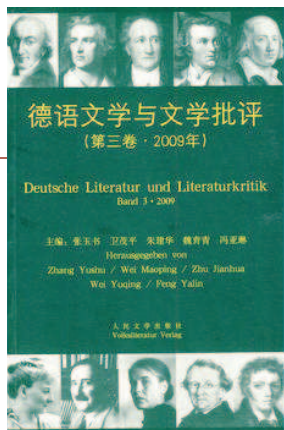
在中国日耳曼学的国际化方面,先生更是功不可没。他与德国多所大学、研究所以及重要文化机构如洪堡基金会、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国际日耳曼学大会等建立合作,学术外交极为活跃和持久,为中国日耳曼学者和德语教师搭建和拓宽了深化交流、大显身手的平台。这位永远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文学“大使”很早就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有了交往,与众多德语国家著名学者建立了友谊,为合作创造了良好的信任基础。他应巴伐利亚文化部邀请考察德国教育制度,在拜罗伊特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巴登符腾堡州科学、研究与艺术部提议下,被选入德国-东亚科学论坛理事会(Kuratorium des Deutsch-ostasiatischen Wissenschaftsforums)。德国图宾根大学授予先生名誉博士学位,表达对先生学术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赞赏。他应邀去美国巡回演讲,与众多美国当地同行切磋交流。圈内人都知道东亚日耳曼学的“三驾马车”,即先生与韩国和日本日耳曼学的元老级学者,德韩文学翻译研究所创始人金秉玉教授和前日本日耳曼学者协会主席木村直司教授。三位老人携手合作,共同促进了三国在德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多方位合作,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

在中国日耳曼学走向世界方面,先生的突出贡献是毋庸置疑、有目共睹的。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在世纪之交时创办了德语学术刊物《文学之路》(Literaturstrasse)。他2009年在德国出版的论文集即名为《走向文学之路》(Mein Weg zur Literaturstrasse. Ausgewählte Arbeiten eines chinesischen Germanisten),力图克服西方的偏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强调交流和沟通,促进理解和互惠。

在第13次“文学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中,先生也深情地回顾了当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创这条“中德文化



张玉书译《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张玉书创办的《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杂志(第三卷)

交流的丝绸之路”的艰难历程。他看到日本和韩国的日耳曼学界都有本专业的学术刊物,感到中国应该急起直追。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文学之路》诞生了,2000—200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起在德国Königshausen & Neumann出版社出版,学术委员会和编辑部由中国和德语国家一些重要学者组成,在《文学之路》上以德语发表学术文章的除了国外学者,主要还有国内各高校德语专业的教师,他们当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术骨干和前途无量的科研新秀。《文学之路》的课题光谱从古典文学到当代文学,从小说、诗歌、戏剧到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从跨文化研究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从纯语言学问题到中德语言之比较,丰富多彩。刊物近二十年来的实践应该说符合先生当年的初衷:充分展示中国日耳曼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长足发展,平视、互惠地与全球日耳曼学学者进行深入的交流。事实上在先生的主导下,这本刊物受到德语国家以及日、韩、美等国的学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好评,在日耳曼学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刊载的论文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相关网页上在线可见。与《文学之路》长年相伴的是“文学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先生精心策划下,迄今为止已先后在德国、瑞士、奥地利以及中国多地举办了十余次会议,主题丰富,视角多元,在国际日耳曼学研究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促进了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

记得2006年10月5日经过德国浪漫派著名诗人诺瓦利斯的故居,先生见其中展示了日本学者的专著和译作,几小时参观逗留下来,深感国内对德语文学精华的译介还远远不够,于是他雷厉风行和大家商量,并争取到德国弗里茨·蒂森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于2007年创办了《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并在发刊词中写道:“海涅曾把他的老师,杰

出的翻译家奥·威·施莱格尔称作探幽寻胜、猎奇夺宝的能手。……我们就以这位浪漫派领袖、出色的莎士比亚的翻译者,作为我们的榜样,把深埋在莱茵河、易北河、多瑙河、奈卡河、伊莎河与密林深处的奇珍异宝打捞、开掘出来,精心雕琢,认真移植,以东方的面貌,华夏的风采,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语言外壳迥异,灿烂辉煌依旧,神韵精髓不变。”这本翻译及评论年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先生亲力亲为,率先垂范,努力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和评述德语文学中的名家佳作,迄今也已出版了九期,主题涉及德国浪漫派、诗意现实主义、魏玛古典文学、流亡文学、转折文学、世纪末文学、女性文学、德语诗歌、德语戏剧。

《文学之路》和《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是先生与他的弟子们和梯森基金会共同建造的“两条从东往西,从西往东沟通中德两国人民心灵的文学之路”。正如一位同事所言,先生“看似有些威严,内心却很柔软”,在文学之路上无比热情地关怀、提携、扶持后辈,无数中青年学者对此深深感恩;先生襟怀广阔,对非985和211的高校也同样是大力支持,他从无一己之私,而是始终以发展中国日耳曼学为理想,带着巨大的热情和无畏的精神投入其中。

先生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推动德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科研发展的发动机之一。如今先生遽归道山,留下了一块巨大的空白。虽不能像在过去近二十年间和先生频繁通信(我用汉语请教,他习惯以德文回复),再也听不到他以雄浑有力、富有磁性的嗓音吟诵海涅的诗歌,但他那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斗志,大公无私鞠躬尽瘁的精神,“盗天火架心桥”的使命感,似乎仍在激励我们前行。

(作者为复旦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教授)

通天与敬天

科学近代化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话题。如何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综合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阐述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课题。

新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一书,恰是一部系统探讨西方天文学如何经由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专著。

诚如傅斯年强调的,历史研究要扩张新材料和扩充新工具,扩大旧范围;陈寅恪等人也主张以新材料治新学问的预流。《通天之学》对“旧范围”和“新学问”的拓展,体现如下:

其一,是对汤若望和欧洲星占术的早期传入及其背景重新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和穆尼阁和中国文人薛凤祚合作翻译的《天步真原》最早介绍了欧洲的星占术,而通过对《天文实用》一书成书时间和背景的解读,以及与《天象源委》《道古堂文集》《皇朝文献通考》等文献的相互参证,可以确切知道,《天文实用》是已知最早专论西方星占术的著作,且对《西洋新法历书》的刊刻和《崇祯历书》的完成起到了转承的作用。同时,作者对汤若望、穆尼阁、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张永祚等人在介绍欧洲天文学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也进行了梳理。

其二,是对康熙南巡和观星台观测老人星事件,从中西史料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揭示了理学大臣李光地学习西学与此次事件的关系。杨光先反教案导致了中西历法之争,也促使年幼的康熙帝亲自向耶稣会士学习。作者指出,康熙帝对科学的重视,并不仅仅是出于兴趣和治理国家的需要,更有出于权术的考量。作为君主与布衣之间沟通的桥梁,李光地在清初科学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与康熙的对问以及仕途的沉浮,很好地折射了康熙如何运用科学新知来达到控制汉人之目的——这一成果也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为关注和引用。

其三,是通过中西文献的互证,重构了康熙时代蒙养斋算学馆成立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并对历法改革的缘起和日影观测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

究。作者从比较科学史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法国皇家科学院(格物穷理院)科学考察计划的介绍,揭示了康熙时代蒙养斋算学馆设立所受到的法国影响;作者还首次指出《历象考成》原名《钦若历书》,其编纂与康熙时代国人“自立”精神密切相关,并分析了康熙帝与“西学中源说”盛行之经过,康熙时代“用其技艺”国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其四,是对康熙时代全国范围内大地测量的研究作了新的拓展。作者根据新发现的中西文献和档案资料,就康熙时期地图测绘的缘起、经过,耶稣会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康熙《皇舆全览图》对后世的影响等一一进行探讨,尤其是对“西洋筹人”耶稣会士安多在子午线测量方面贡献的还原,弥补了学界相关研究的空白。

其五,是对科学与宗教关系作了进一步探讨,主要涉及奉教天文学家在“礼仪之争”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康熙和乾隆时代耶稣会士与哥白尼学说的传入,并推断安多最早向黄百家介绍了哥白尼学说。通天与敬天,构成欧洲科学在明清之际传播的主旋律。作者指出,耶稣会士以科学和艺术的名义,为天主教事业工作,天文学成为通达皇帝的工具,维系了天主教在禁教期的艰难发展,也使得近三百年的中西交往得以持续。

此外,书中还考证了一些天文学译著的欧洲来源,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如指出冈明我所编《方星图解》译自法国耶稣会士巴蒂斯的星图;巴黎天文台所藏雍正刊本《御制历象考成表》由戴进贤所编,来自耶稣会士N. Grammatici的著作,牛顿月球理论由此间接传入;指出乾隆时代天文学著作编纂背后的复古倾向,并对此现象作出了解释。

(毛志辉)

